

撰文 / 張簡敏希 | 攝影 / 黎歐創意
照片提供 / 張簡敏希

當代的我們， 都是客家的紀錄者

「你是誰」、「你是什麼」、「你在哪裡」、「你為什麼在這裡」。

美國靈性和個人成長暢銷書作家尼爾·唐納·沃許 (Neale Donald Walsch)，在《與改變對話》一書中，提出這是轉變觀點的「生命的四個基本問題」，這四個問題也是所有議題的根基，包括族群認同意識。

全臺灣有 200 多個大大小小的文學獎，但我偏偏對《後生文學獎》情有獨鍾。連續參加《後生文學獎》八年，寫客語詩、散文、小品文、小說，無論是自身經驗、周圍的故事、杜撰，其實都是我在追尋答案的歷程，不只是我，我們都在建構「後生」所理解的客家觀點。比起紀錄者，我更覺得自己是個見證者，透過參與的方式，在戲棚下「蹲點」，一點一滴把這個文學獎的改變與轉折融成我生命的一部分。

相較於主流文化，客家是客體，比起書籍出版，文學獎是客體，而之於這個獎，我是主體，同時也是客體。關於主客的關係，我特別喜歡詩人廖偉棠曾說過的一席話：「我們作為使用邊緣語言的人，對於其他語言，我們能做的就是提供一種意識、一種差異性的感受給主流語言，逼它生變，而不是包圍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整體。」



後生帶路： 張簡敏希

苗栗客家人，曾任電視節目企畫、文字工作者，連續獲得八屆後生文學獎肯定，曾參與客家電視台《阿公阿婆神救援》、《Go! 蔬菜小隊！》等節目企畫、「歡喜扮戲團—客家女聲」巡迴演出。

GO



《羅思容電視音樂專輯》是我第一個參與執行的節目，猶記得門外「On Air」燈亮起，棚內思容老師赤腳站在臺上，四周佈滿前天從內湖花市載來的鮮花，配上乾冰，迷霧中形成仙境花園，老師的歌聲時而高亢，時而如呢喃，舞蹈家彭筱茵優雅起舞，詩人劉慧真在舞臺一角讀詩。在 20 歲的我眼中，客家音樂與客語詩是相輔相成的，也是我至今仍努力想達到的境界。

在電視台工作的我們，多是追夢的北漂者，就算不是，我們在家鄉的鄰里間也是夢幻而值得驕傲的存在。

而城市的工作漸漸在我們腦中建立了「下鄉」的概念，那是對自身家鄉有所感知、重新回溯、認同自我的過程，哪怕一輩子住在臺北，也會聽到臺北的客家人說，他們的家族自某縣市客庄北上移居，所以、或許大家北漂，都是為了終有一天能回家，「下鄉」的客庄就是我們的原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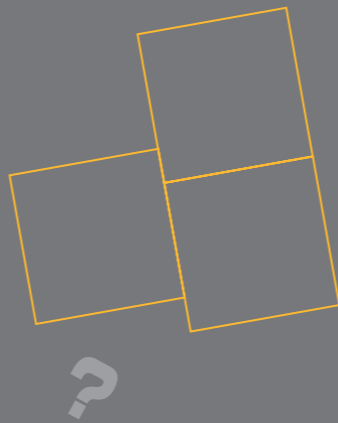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這裡成為孕育創作最沃實的土壤，各地的故事被集結在此流轉。

我開始創作也是因為想家，臺北最不可思議的魔力是引起每個離鄉人最深刻的鄉愁，那種感覺以客語來說更貼切——「心焦」。

為了回家而寫 給自我認同的情書

「將自己種下 / 種在離鄉這麼遠的泥土裡 / 我會發芽 / 聽到那驚蟄的雷響 / 新葉迎著春風搖」——米莎《落地歌》

「客家電視台十週年-時時刻刻客音樂會」辦在臺北客家文化主題公園，音樂戲劇中心與公園內的義民爺對望著，帶有些許酬神的意味，此前我壓根沒聽過義民信仰，猶記得阿婆說過祖輩居於深山，是日本警察不會來訪的地方，因此完整地保留了語言，原來我村之於普羅大眾所知的客家信仰也是遙遠的。



01 在客家電視台錄製 《O! 蔬菜小隊》 的張簡敬希。



臺北不是我的家 但沒來臺北的我不認識客家

「名字一旦被奪走了，就會找不到回家的路。」——白龍
《神隱少女》

我家前面那條路被稱為「下街」，村莊主要的店家、市場、住家都集中在「上街」，從字面上的意思就能想像它是由下而上的緩坡。客家人最常被提醒的是不能忘本，彷彿是為所有山城客庄子弟量身打造，客家電視台就設在康寧路三段 75 巷，那條陡坡最靠近頂端的位子，我們笑稱是「客家好漢坡」。

2013 年，我成為客家電視台第五屆「後生提攜計畫」節目部音樂組的實習生，彼時正是開台十週年，是全台上上下下都忙著製播特別節目的時刻，我每天都徜徉在各式客家音樂中，因為《詩與歌的對話》單方面的認識了詩人杜潘芳格與張芳慈，又因為《鬢髮花》這首歌，開始讀葉國居老師的作品。

時至今日，電視台在我眼中仍是神聖而特別的，普通大樓的內裡藏著一個個巨大的黑盒子，它奪走時間意識，獨自創造白日與黑夜，隨時可以颶風打雷，能仿冒不同的場景空間，那是最逼近人類造夢的地方，也讓我神魂顛倒、魂牽夢縈。

「臺北義民嘉年華」對我而言，就更是重塑文化信仰、歷史背景最關鍵的活動，每年的這一天，轉播準備工作總始於清晨 5 點，我們依偎著義民爺前方微弱的燈光用早膳，那是個隱隱感到恐懼可又寄與寄託的時刻，隨天光亮起，信仰的網也撒下，臺北的客家人從四面八方緩緩靠攏，乃至各縣市的義民爺與鄉親都聚集於此，於是臺北成為了客家人的臺北。

小時候常常被阿婆「弄丟」，遺失在風景區、麗嬰房外的搖搖車上、夜市裡。我總在人群中工作，但我其實很害怕人群，尤其當嘉年華隊伍進入主題公園之後。植物生根與深根是完全不同的時間差，生根初期，我一直想從這種迷失的不安中找到歸屬。

印象最深刻是假日獨自到主題公園，參加由洪馨蘭老師主持的「城市客家青年遺落的鄉愁與重構」，被我遺落的可能不是鄉愁，而是農村技能，在鄉村該拿什麼作為生存的根基？無論把自己當主體還是客體寫，事實是我們都已經離鄉。

要把一個人的濃情蜜意，或「農」情蜜意留給朝九晚五的自己，因為筆是我們的鋤頭，漸漸之於這座城，我們也就深根了。

夢裡不知身是客 有夢想的人不需要醒來

阿公曾住在臺北三個月，學習開怪手建「石礮」，他告訴我「臺北是一個賺夢想，但賺不到錢的地方」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孫女是個不喝夢想會枯竭的人，就跟他的橘子樹一樣，只是我不會耕種，所以我喜歡支持別人完成夢想，有夢想的地方就有故事。

比起眾所皆知的傳統菜市，我更喜歡藏在臺北街巷裡頭的攤商，那是我生活中族群與語言融合最顯著的地方，無論你來自何方，語言的轉換及流動總是自然而然，只是鮮少有年輕身影穿梭。後來認識了圓山市集，彷彿又開通了我另一條任督二脈。

「對於城市而言，商業活動的多樣性在社會層面和經濟層面上都無比重要。多樣性的零售環境…會營造豐富的文化生活、創造不同的城市景觀和吸引多元的都市人口。」——珍·雅各 (Jane·Jacobs)

市集將年輕一輩的消費者拉回沒有冷氣的空間，和裸賣的蔬果面前，可前提是市集總是整齊劃一、乾淨、帶點文青風。來自客庄的農友們多從桃園、新竹、苗栗來，遠的甚至是從花蓮翻山越嶺，他們多是曾在臺北工作、生活，後來因為各種因素毅然返鄉，重新開始也好，輾轉接手也罷，都如鮭魚迴游，帶著農產品又回到這座城，試圖在城市消費者心中種下對友善農耕多一份認識的種子。

教外國朋友中文時，我會告訴他們「買賣」的發音就是「My Mind」，看似是自由意識的行為，其實是潛意識間對一件事物的認同，以及價值的評估。身為「脫北者」，這些農友對臺北的情感不亞於仍住在這的人，只是在天時、地利、人和加持下，戰勝了對北漂的執著。

我始終以身為農家子弟，身上帶著點土味而感到自豪，我認為土味是一個人對作物的深情，也是大雨洗刷後，對大地清香感到陶醉的狀態。圓山市集是比圖書館更適合我的地方，農友們向我解釋農耕方式、改良品種的差異性、對付病蟲害的方法時，腦中與筆下即是農田，多美好而純粹。

打開文字的地圖 讓議題成為導航

「左轉有書」藏匿於臺北喜來登大飯店後方，緊鄰天津街，周圍是立法院、行政院與監察院，它對自己的介紹是「臺灣唯一的社會運動主題書店」，這也是客家委員會所舉辦的「參詳·當代客家文藝沙龍」的主要場地之一。

當代咖啡廳與獨立書店肩負比本質上更重大的理念與使命，吸引人們光臨，最主要的目的是產生思想碰撞及交流，回顧幾位知名的藝術家與思想家，也是在這樣的空間裡，尋找志同道合的靈魂，或找到人生職志，例如咖啡館詩人彼得·艾頓伯格 (Peter Altenberg) 之於維也納最著名的中央咖啡館。



02 張典婉老師（左一）於2022後生文學獎座談會中講評。



03 張簡敏希參加後生文學獎講座，神情專注地聆聽分享。

引領我進入思想交流場域的是報導文學作家張典婉老師，她在我心目中就是臺灣版的 Jane · Jacobs，Jane · Jacobs 在臺灣最著名的著作是《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》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帶著社區媽媽們，保衛華盛頓廣場公園的那段故事，她的都市理論「Eyes on the Street」（凝視街道）一直深深吸引著我。

初認識典婉老師應該是在第一屆《後生文學獎》，當時就覺得她是個「Eyes on the Hakkā」的人，報導者最令人感動的涵養都在仗義直言的語句間，她就是那個見證客家文化、歷史、時代變動誕生與衰亡的人。

這也是我從自身故事，漸漸轉型寫議題的原因，我喜歡農業，同時也看見農村困境，重視文化保存，又同時體會文化式微，翻開事情的一體兩面，只要我們仔細觀察，其實每個人都是議題的一部分。

我坐在「左轉有書」將客家文藝沙龍的內容記錄成文字，才意識到客家所能討論的不僅止於文化與語言本身，它本就是公共議題的一部分，當代議題都能被客家討論，生命之所以豐富，是在不同的思想、經驗中彼此碰撞，擦出火花，進而燃起熊熊烈火。之於我，那是一段快樂的歷程，覺知客家、族群、文化、語言、飲食、藝術、音樂可以用如此豐富的方式被探討、被融合。

在臺北生活將近十年，我們都深知，也深刻體會到它是知識最集中、最豐厚的地域，找得到各種充滿故事的空間，也尋得到各行各業充滿生命歷程的人。

價值要靠自己尋找答案

曾到「阿嬤家－和平與女性人權館」觀看女性人權影展中的一部電影《太陽之女》，片中那些捍衛家園、家庭與孩子的女戰士們說著庫德族方言，一字一句堅決而堅定。我的世代在生活表層，原則是安逸與安全的，雖然引用電影中法國戰地記者的話，顯得有點突兀，但我相信一個族群走到現在，它歷經的風霜是難以想像的，它絕非要我們堅守其中，而是帶它與更多族群與世代融合。

「這世界太過冷漠，大家似乎都漠不關心。人們只喜歡消費希望、消費幻夢、想盡辦法不去面對醜陋的真相，即便如此，真相仍值得被報導出去，雖然無法討好大眾，但我只為自己而做這件事，還有替那些無名英雄們發聲。」——《太陽之女》

我們所想觀看的世界，取決於我們如何發聲，生活在臺北，或許恰巧正是最適切的环境，會隨風浪漂至此，不就是相信這裡蘊藏著機會嗎？

所以回到源頭，「我們為什麼在這裡？」

如果人的實像能創造理想，我覺得滿街都是滿坑滿谷的客家故事，只是需要更多人像我一樣，霸佔著戲臺前的紅色塑膠椅，這樣歡騰的收冬戲就不會有沒落或結束的一天，我們就一直能有「過家」、「食福」的去所，雖然跟傳統年節不同，可是當代的我們，要一直勇敢的告訴所有人，在臺北生活的我們，沒有忘記重要的文化，甚至學到更多應該被理解的過去。

